

为了永远的怀念：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

父亲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总理是个伟人”

舒乙

我记得我父亲老舍和周恩来是一辈人。很多人问周恩来高寿，周恩来一般这么回答，他说：“我和老舍、王统照、郑振铎同庚。”

周恩来喜欢同文艺界的人士交朋友，和其中的很多人是生死之交。我父亲与周恩来相识是在武汉。那时抗战刚刚开始，要组织一个文艺界抗战组织。根据现在了解的情况，是周恩来找冯玉祥商量，到底全国统一战线文艺家的组织由谁挑头比较好？周恩来建议不要让郭沫若和茅盾出面。最好另找一个人，这个人党派背景比较弱，但要非常爱国，文学上又很有造诣。冯先生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就推荐了我父亲，说他一个人拎着一个大箱子刚由济南逃出来抗战，而他的家小又留在济南。是否可以请他出来主持这个事情？周恩来欣然同意。

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是现在的文联和作协的前身。

大家一致推荐我父亲担任总负责人，当时不设主席，设立了一个总务部，主要是怕国民党当局派人抢占这个位子。总务部对外代表文联，对内管理会务，大家选举他任负责人。从那时候起，由他连任这个职务，一直到抗战结束。

成立大会在武汉总商会举行，周恩来出席并作了一次讲演。讲演非常生动。我父亲对成立大会还有记述，说周恩来讲演时，突然提出他要早一点退席，说是自己的父亲也由乡间逃出来了，今天就到武汉，他要来接他。这件事说明全国的老百姓都受到日本的侵害，全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据我所知，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周恩来。

由那个时候起，我父亲就非常崇拜周恩来，一直到解放后变成他最崇拜的一个人，最喜欢的一个人，提到的次数也最多的一个人。其中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事情是，周恩来召唤我父亲从美国回国。我父亲1946年接受美国政府的邀请，与曹禹先生到美国讲学去的时候，周恩来还在重庆。我父亲去同周恩来告别同时请示他：我们该不该去？去了注意什么？周恩来搞了一次小型欢送会，请了很多人给他俩送行，还讲了许多话。

我父亲走了以后，国内进行了解放战争。到1949年6月，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会合在北平，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推选第一次文代会的主要领导人时，周恩来就讲，现在缺一个人，这个人是老舍先生，他在纽约，咱们想办法把他请回来。

在周恩来的授意之下，当时大概

有二三十位知名文艺家，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就联名写了一封信，邀他回国。这封信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转到纽约，送到我父亲手里。

我父亲接到这个邀请以后，立刻回国。当时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刚刚开刀。他忍着痛秘密地赶回来，但没有赶上开国大典。

我父亲1949年年底回到北京。1950年年初，在北京饭店举办了辞旧迎新的作家会议，周总理出席了这次聚会。这次聚会是为了欢迎我父亲归国。当时我父亲就住在北京饭店，周总理还上楼到他的房间去看他，两个人叙旧，非常高兴。周总理说：“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你又是北京人了。”

因为我父亲出生于穷人家，他对这个新的政权非常喜欢，所以，有一种狂喜的感觉，他立刻投入歌颂新政权的文艺创作中来。1950年他写的第一个剧本《方珍珠》，送给中国青年艺术节去演。紧接着在同一年，他又创作了《龙须沟》。《龙须沟》实际上是周总理点的题。他还告诉人民艺术剧院的李伯钊，你记清了，老舍写的这个剧本，非常生动，为什么穷人喜欢这样一个新的政权，通过故事告诉大家一个浅显的道理。

我父亲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很快写出本子。写出以后，周总理非常高兴，他喜欢这个本子，就请菊菊隐出来导演，一批年轻的演员来演。这些演员现在都是有名的演员了。演出以后，效果非常好。

全国开始演这个戏后，周总理就推荐毛主席看这个戏。毛主席一般喜欢看评戏、京剧、梆子戏，看话剧比较少。但周总理还是推荐给他，说这个戏你得看，这个戏好。所以在中南海为毛主席、朱老总等中央领导人专门演了一场。在演出之前，周总理专门把我父亲介绍给毛主席，说这个戏就是他写的。其实我父亲和毛主席在延安见过面的。这个戏最后使我父亲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周总理是极力支持这个戏的。他建议周扬写一篇文章来表扬我父亲。文章的题目就很有意思，《向老舍同志学习》。事后全国的大文艺家都向老舍先生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老舍先生的文艺贴近社会主义的生活，贴近老百姓。

这个戏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告诉老百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很快地掌握政权，不仅掌握，而且巩固下去，就因为它替老百姓办事。周总理看到这个价值，就大大地表扬他。

从这以后，周总理经常给我父亲出题：“你要写个什么”。这个成了我父

亲的口头禅，说，周总理又给我出题了，让我写个什么什么。他差不多一年写两三个，他进入自己的创作旺期。

在“三反”、“五反”时，周总理给他点了一个题，说：你要配合“三反”、“五反”写一个话剧，这个话剧很需要。这个题目很难，一般地讲，写作的时间与所写作的对象，要拉开一定距离，而这个“三反”、“五反”运动刚开始，周总理就给他出题了。所以他写得很快，大概前后重写了10次。相当于写了10个剧本，整个剧本的手稿大约两打厚，现在《春华秋实》手稿擦起来特别厚，的确相当于写了10个本子，用了10个月，费大劲了。

经过10个月，“三反”、“五反”运动就结束了。周总理就把他叫来，说，我要给你详细地讲讲我党的政策，你再改一遍。我们党已经形成完整的一套周密的政策，这些你还不不懂。

周总理非常细致，他事先到剧院把这个戏又看了一遍。看完以后，把导演找来，把主要的演员找来，把次要演员也找来，个别谈话。他问演资本家的演员：“你演这个戏，自己感觉怎么样？别别扭扭？”小演员说：“有点别扭。”他就收集了这些反映回来，说，这个人物不行，那个人物不行，那个人物怎么改，我们的政策是怎么回事。包括很多细节，穿什么服装，用什么道具，还有音响，他都在行。

有一次，我父亲给人艺写了一个戏叫《女店员》，歌颂在“大跃进”中家庭妇女走出家门离开锅台，到社会上服务，当了售货员，气象很新。这么一个喜剧，那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周总理带着财政部长李先念去看，说这个事是你们财政的事。看完以后，很喜欢，说今天得照相。上台照相的时候，他不坐在中间。他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把戏中的几个老太太找来坐在中间。”他跟李先念、导演、编剧全在边上，合了影。

《茶馆》是一部很有意义的戏，当时是很有争议的，幸亏周总理出来，保了这个戏。因为当时“左”的思想已经出来了，看不上这个戏，觉得这个戏怀旧呀！没有红线呀！没有革命呀！不喜欢。但是演员喜欢得很，观众喜欢得很，文艺界艺术家喜欢得很，就请周总理看。周总理称赞这是一部好戏，尤其是第一幕、第二幕是精品。这个戏的价值在一幕、一幕，旧社会是多么可怕，这是很好的一堂课，而且写得极其生动，特别好。

这个戏第二度演出的时候，国内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啦！也是周总理出来，说一句话，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才没有被“枪毙”。

“文革”的时候，这部戏整个被否定了。“文革”初期，我父亲受到严酷的迫害，他1966年8月23日投水自尽了。这个事来得太突然，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那天清晨我们就得到这个消息，他失踪了。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和大妹妹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就在衣服里面套了我父亲的血衣，我要告诉周总理，我父亲受到严酷的摧残，情况非常紧急。我就到接待站去递这个消息，要让周总理很快知道家里发生的大事情。负责接待的人看了以后，说：“你放心，我们立即把这封信转交给周总理。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我还没到家，妈妈就接到电话：“信收到了，周总理对这件事表示极大的关注，不要太着急，我们正在想办法找。”当时我正在回来的路上，到家时我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样子，周总理对当时的秘书长周荣鑫说：“你呀，想办法到老舍夫人家去看一看，看看他家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呢，必须代表我去对她表示慰问。”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基本上把我父亲打成敌人，家里完全被抄，完全破灭了。周荣鑫没有敢来，不方便。这样，周总理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找到了王昆仑副市长。王昆仑与周总理非常熟，跟我父亲又是好朋友，都是在重庆那个时候的老朋友了。周总理问他：“老舍先生不在了，你是否知道？”王昆仑正好是最后一位留下来的北京市领导人，他当时算是一个民主人士，其他的人全部都被整垮了。他说：“我知道，我有一些耳闻。”周总理对他说：“好，你晚上到我家来，一定来，我要跟你详细谈一谈。”夜里，王昆仑见到我母亲，把这些情况详细说了。他就说：“你呀，把你所知道的老舍死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对这件事情正在进行调查。我还没有调查清楚，你既然是一个当事人，当然，我希望你把情况真实地告诉我。”

王昆仑曾经到了孔庙，看到过残酷斗争文艺家的情况，但他不敢出面，也无法阻止当时的这种场面。他远远地看见，非常焦急。当时，受伤最重的是我父亲。王昆仑把所看到的情况以及后事的情况都跟周总理讲了，大概给周总理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慢慢地感到有一只巨大的手，在后面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人员的待遇，包括财产，包括存款，当然，我希望你把情况真实地告诉我。”

但是，我父亲之死，在周总理的心

里留下非常大的阴影。他觉得遗憾，他没有来得及保护我父亲。所以大概在我父亲去世以后的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社论出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父亲之死这件事经常在周总理心中浮现，到他晚年重病的时候，1975年，他在北海三〇五医院养病，8月23日这天，他走到北海边上，对着湖水默默沉思了一阵，他突然问旁边的医护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医护人员想一想是8月23日，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他说：“总理，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周总理说，我来告诉你：“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有点耳闻，不很清楚。”“我清楚，我告诉你。”他非常详细地讲了我父亲去世的经过。

这些经过，显然是他经过调查得来的。由此可见，我父亲在他心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过了几年，周总理去世了，“文革”也结束了，经过邓小平同志批示，我父亲在被迫害的文艺家当中很早得到了平反。因为邓小平同志说过：“像老舍这样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

1978年6月，在很隆重的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邓颖超来得最早，她提前半个小时就来了。到了以后，把我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召到一起谈话，她讲：我今天是故意提前半个小时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来生前多次提到老舍先生的名字，对老舍先生的死，他表示了非常大的悲痛，他念念不忘这件事。所以我今天来是代表恩来同志来的，如果他活着，他肯定提前来，他肯定对这件事情表示悲痛。她说：他对老舍先生非常尊重，他们俩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所以老舍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觉得，老舍先生的去世是文学界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觉得没有保护好老舍先生，他自己觉得非常内疚。

他们之间这种深厚友谊，我在父亲生前多次谈话当中也能够体会出来，他很爱说的一句话是：“总理是个伟人。”他每次跟周总理谈话以后，总是召集全家在一起，来讲一遍周总理讲了什么话，周总理对他有什么指示，要他做什么事情，非常兴奋。每次都是这样的，看得出来他是由衷地佩服周总理。

我记得，郭沫若、梅兰芳等人入党的事对我父亲影响很大，他也表示了强烈的愿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总理就到我家里来了，跟他长谈了一次，大概有整整一个下午，谈的内容，没有透露出来。但是从那以后，我父亲就不再提入党的事了。

所以，我想周总理跟我父亲之间的友谊不是一般的，的确周总理对别人说的那样，我跟老舍一般大，我们都属狗的。他用这种比喻来说明他同文艺界的关系。

我父亲的职务很多，有一个职务是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在抗美援朝时，他同贺老总到朝鲜慰问过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贺老总是团长，他是副团长。到了那儿，他就被志愿军感动了，就对贺老总说：“我要住下来写本小说，写志愿军，你看可以吗？”贺老总说：“可以，我要给志愿军司令部打声招呼，让他们照顾你。”他就下了决心，真的写了一部小说，写上甘岭的事，这部小说叫《无名高地》。

那时，朝鲜客人很多，大家都喜欢喝酒。有一次他醉了酒，回来很晚，这件事被周总理知道了，第二天就批评他。我父亲回来，头一句话就跟我妈妈说：“今天被批了一顿，总理批评我了，昨天晚上醉酒，总理批评我了。”从那以后，在外交活动上喝酒他就很小心了。有错，周总理就批评他，周总理对他关心无微不至。

有一次，我父亲有一点感冒，我妈妈就给他一点药吃。后来，被周总理知道了，周总理见到我妈妈，严厉地批评她：“你怎么敢自己动药，他是国宝，他生了病，你要送他进医院，你不能自己来。”当时我妈妈很委屈，可是周总理还是说：“这不行，你第一要报告我，第二要送他进医院，我们大家要很好地保护他，爱护他。”

我觉得，我爸爸在“文革”中忧心忡忡。有一次他自己吐血了，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以后，他非常想见周总理，但是他考虑到周总理太忙，情况又非常复杂，他没有说话。他去世后，我们才发现他枕头旁边有一个小学生用的小本子，上面写了一句话：“总理你不要来看我。”他实际上很想让周总理来，两个人再进行一次掏心窝的谈话。他绝对把周总理当成最贴心的人。

对我父亲来说，发生了天大的事，最大的事，最难办的事，主心骨都是周总理。当然他最后的信息是没有发出去，周总理不知道，他突然就去世了。他的去世是一个大的悲剧，他跟周总理之间的友情突然断裂，对他来说是重大的悲剧，这悲剧果然压在活下来的周总理身上，导致他重病的时候，他的思绪很容易回到我父亲身上。

我觉得我父亲和周总理之间是生死之交，值得长久地流传下来。周总理是历史巨人，也是我父亲的最大知音，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老舍长子舒乙）

周恩来的「家宴」：一盘苦瓜暗含深意

付裕

1968年8月，15岁的周秉建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去内蒙古大草原深处的牧区插队。

当时，由于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因为怕得不到批准，执拗的姑娘就一次次地写申请，一趟趟地找学校的负责人，一遍遍地找西城区安置办的同志和内蒙古来京接收知青的工作人员“泡蘑菇”。几个月后，她终于如愿以偿，获得批准。直到此时，周秉建才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

“虽然我接到通知，说在任何一天下午都可以去西花厅，但我还是在临行前头一天的晚上，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后，才到伯伯家。”周秉建回忆道：“我去的比較晚，夜凉如水，华灯初上，伯伯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在工作。从小我就知道绝不能打扰伯伯工作，因此，我先去见伯母，在客厅边交谈边等着伯伯下班。”

“当时，伯母知道我要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特意给我讲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时，刘伯承元帅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共同结盟的故事。”周秉建说：“她叮嘱我要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要和他们团结友爱。”我们谈得很开心，直到伯伯从办公室出来。

“他见到我，特别高兴。特别正式地伸出手来，像接见外宾一样，用力地和我握手！”提起伯伯像大人一样对待她，周秉建一脸幸福地说：“伯伯的手臂受过伤，弯的程度不是很自由，但他特别认真、特别高兴地和我握手，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周秉建回忆说：“这是我从小学大，第一次听到伯伯不叫我的小名而称呼我的学名，心里油然而产生了一种‘伯伯这是在和我谈话，我已经长大了’的感觉。非常开心。”

“吃饭晚的时候，饭桌上有一盘青菜，我既没吃过也没有见过，心里正在琢磨，伯伯就指着这盘菜高兴地给我介绍说：你尝尝，这是苦瓜，很好吃，是主席的家乡菜。特意为你准备的。”周秉建说：“我吃了一小块，确实苦，因为以前既没有吃过，也不知道有这种菜。但是，心里也是明白的。知道这是伯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嘱咐我，要准备随时吃苦，接受锻炼。”

所以，“我自己暗暗地下决心，到了草原，一定要不怕困难不怕吃苦，不能辜负伯伯的期望。因此，我就逼着自己，又多吃了两块。”周秉建微笑着回忆道。

周恩来为何一生是个“旱鸭子”？

秦九凤 文/图



左起：陪练员、成元功（周恩来卫士长）、周恩来、黄莲华

因事情太多，只学了一次又因有事要返京就搁下了。

1961年8月23日到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时间比较长，日程安排得也不是很紧，基本上是半天开会，半天休息，每周三晚上有电影，周六晚上既有电影还有舞会。周恩来钟爱散步，他大多是在庐山的风景区内散步，周六偶尔去跳跳舞。

大约是8月初的一天，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芸在庐山上碰到曾在北戴河教过周恩来游泳的国家体委女教练黄莲华。她对郑淑芸说，游泳不仅是一个体育项目，更是非常好的健身项目。并说，毛主席喜欢游泳，他的身体那么棒。这次上庐山后，毛主席已几次到芦林湖游泳了，希望总理也能去游泳。

就在那天郑淑芸回到住地时，就向邓颖超建议让周恩来再去学游泳：游泳可以活动全身肌肉，活动筋骨，是一项非常全面的健身活动。等周恩来到餐厅吃饭时，郑淑芸和邓颖超一起动员他去芦林湖学游泳，又告诉他，芦林湖那儿有国家体委派在那里的教练。还告诉他，毛主席已经去游过三四次了。周恩来终于被说动了，同意下午去芦林湖学游泳。

午饭后，周恩来没有休息，下午又没有会，他们就乘车来到芦林湖。据成元功事后对笔者回忆，那天天气晴朗，湖水清澈见底，水中还倒映着山峰、树木的影子。国家体委派来的女教练黄莲

华早已等候在那里了。她一见周恩来走下车，就飞快地迎上来，周恩来和她亲切握手。因为她在北戴河已经教过一次总理游泳，彼此都熟悉。所以，周恩来一到就脱了衣服下到芦林湖。黄莲华、成元功马上左一右一，既教他泳技，也护卫他的安全。

黄莲华教得很认真，周恩来学得也很认真。然而，由于周恩来1939年在延安右臂受过伤，右臂无法伸直，划水时，左右力量无法平衡，特别是右臂基本上使不上劲。结果，黄莲华教了一个中午，周恩来学了一个中午，虽然教、学都很

认真，但进展不大。周恩来最后只能在水上漂起来，而要想游着前进却始终不可能，原因就是两臂用力不均，他的身体总是在水里转圈子。当时，许多人听说总理来学游泳，都跑到芦林湖岸上看，不过始终未能看到周恩来游水前进的画面，只有杨尚昆儿子杨绍明拍下一张照片。这可能是周恩来唯一一张泡在水里的照片。

两次学游泳没有学会，周恩来的闲空本来就更少，以后再也没能有机会再学。所以，他终生都是一只“旱鸭子”了。